

- [2] (宋) 朱熹, 记三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卷七十一. 见 四部丛刊[M], 商务印书馆编, 景印本, 1935 年
- [3] 杨庭硕. 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以苗族族名为例[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 [4] 范同寿. 贵州简史[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5] (日)村田雄二郎. 中華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最後の帝国』:中国. 蓮實重彦等編. いま、なぜ民族か[C].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4 年
- [6] (清) 魏源. 西南夷改流記.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M]第八帙
- [7] 清朝文献通考[M]卷十九·户口. 嘉庆会典[M]卷十一等。见梁方仲. 中国歴代戸口·田地·田賦統計[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 [8] (清) 罗绕典. 黔南职方纪略[M]. 道光 27 年修、光绪 31 年补刊本, 日本东洋文库藏。
- [9] (清) 田雯. 黔书[M]上卷·苗蛮种类部落。见贵州古籍集粹 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10] 爱必达. 黔南识略[M], 乾隆 14 年修, 道光 27 年刊本, 日本东洋文库藏。
- [11] 李汉林. 百苗图校释[M].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12] 石启贵.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 [13] 金天明、王庆仁. “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J]. 民族研究论文集[C] (第一集).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1981 年
- [14] 孙隆基.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J]. 历史研究. 2000 年 3 期。
- [15] (日) 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 辛亥革命の思想[M]. 筑摩書房. 昭和 43 年(1968 年)
- [16] (日) 吉澤誠一郎. 愛国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見る[M]. 岩波書店. 2003 年
- [17] 章炳麟著、徐复注. 尙书详注[M].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 [18] 林純声、芮逸夫. 湘西苗族調查報告[M] 国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单刊甲種之十八.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民国 67 年 (1978 年) 再版。
- [19] 梁启超.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J]. 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M]. 第四十一 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925 年刊本
- [20] 蔡锡龄. 红苗纪略[J].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M]第十二帙。
- [21] (日)河田悌一. 中国近代思想と現代—知的状況を考える[M]. 研文出版. 1987 年
- [22] (挪威) 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 エスニック集団の境界[J]. 青柳まちこ編译: エスニックとは何か[C]. 新泉社. 1996 年

【论 文】

“蚩尤平反”与“炎黄子孙”

——兼论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整合的两条路线¹

杨志强²

摘要: 自 1992 年开始兴起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 在 20 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思潮中诞生的“炎黄子孙”的言说又被重新提起, 并成为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 围绕着“炎黄子孙”这一提法以及在全世界华人中兴起的“炎黄热”, 却引起了来自中国部分少数民族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异议与争论。以下, 本文拟通过对九十年代以后在汉族社会和苗族社会中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 年 (第 27 卷) 第 4 期, 第 103-113 页。日文版刊载于《社会学研究纪要》64 号, 2007 年, 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

² 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 现任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兴起的“炎黄热”以及“蚩尤热”的追踪和考察，对在清末民初形成的“炎黄子孙”与“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近代中国国民整合路线的不同内涵加以初步的整理与分析。

关键词：苗族、蚩尤、炎黄子孙、国民整合

一、围绕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与“釜山大结盟”的争论

1997年2月7日，正是中国传统农历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推出了14集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该节目是以中国五千多年前的传说时代为舞台，以传说为汉民族最初始祖的炎帝和黄帝的事迹为中心展开的。在剧情安排上，这部电视剧把汉民族始祖的炎黄二帝，塑造成慈祥，正义而充满了怀仁辅义美德的君子，描绘成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幸福的智慧化身。而与炎·黄对立的一方的“九黎·三苗”部落首领的蚩尤，则被描写成一个愚昧、凶狠、残暴，给人类降临灾难的恶魔，以至于最后连他的妻子、儿子都背他而去，投靠到炎黄的阵营中。作为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环，这出电视剧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广播电视厅组织创作的重点节目。在该电视剧播出的同时，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在2月20日发行的报纸的第三版用整版篇幅进行了宣传。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部长孙家正、《求是》杂志副总编荀春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道明等人在其中发表了评论文章，对电视剧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

然而，电视剧播出后，围绕着对于剧中反角人物——蚩尤的描写和评价问题，却引起了来自少数民族的苗族社会知识分子的异议。这其中，在中国苗族分布最集中的贵州省，以苗族知识分子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民间社团组织的“贵州省苗学研究会”（以下简称“贵州苗学会”）内的苗族知识分子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对上述电视剧中对于蚩尤这一人物的丑化描写表达他们的不满以至于抗议活动。时任贵州苗学会秘书长、从事美术创作工作的苗族美术家杨培德为此代表贵州苗学会，撰写了《电视剧“炎黄二帝”播出引起苗族强烈不满——对电视剧“炎黄二帝”的研讨意见综述》的报告书，对电视剧连续剧《炎黄二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蚩尤作为苗族的祖先，他也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而在《炎黄二帝》中，对于蚩尤的丑化描写以及部分汉族学者对于蚩尤的评价，明显地是把蚩尤剔除在“中华文明”的缔造者行列以外，事实上否定了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起源的观点，“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为地去割裂一体的中华文明，有意识地在中华文明里播撒下互相排斥的种子，伤害参与创造中华文明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电视剧《炎黄二帝》播映后所产生的离心力，可能会逐渐加大，不满情绪将会蔓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其不良影响。”^[1]

杨执笔的这份报告书，除了提交到各级政府反映情况以外，并且还发表在了苗学会的内部刊物《苗学研究通讯》上。不久，第八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苗族人大代表龙明伍（伍略）、张明达（均为贵州苗学会的领导成员）就电视剧《炎黄二帝》问题，除上书中央以外，还以人大代表提案的方式，在对“炎黄子孙”的提法提出质疑的同时，指出该电视剧对蚩尤形象的描写严重的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之间的团结。这一事件最终引起高层的注意，同年5月21日，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给二位苗族人大代表复函，全文如下：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龙明伍、张明达同志：

你们就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给丁关根同志（笔者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信，关根同志和中宣部有关领导十分重视，将此信批转我部处理。孙家正部长立即作了批示，要求我室根据中宣办的有关通知精神再次向电台、电视台打招呼，今后不要使用“炎黄子孙”的提法，不再重播《炎黄二帝》，同时加强民族团结的正面宣传。

我室已及时将此精神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作了传达，



并用“通报”的形式传达到全国各广播电视厅（局）、电台、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已做出不再重播《炎黄二帝》的决定。

民族问题是个十分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各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坚决维护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的正面宣传。

你们对《炎黄二帝》所提的意见是中肯的，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启发和帮助。感谢你们对于广播影视事业的关心，并希望今后对广播影视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广播电影电视总编室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抄报：丁关根同志、徐光春同志、孙家正部长^[2]

这样，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在播出以后，在以贵州苗学会的苗族知识分子们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社会发起的集体抗议行动下，没有再被重播。在上述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文宣示了今后在官方媒体上不再使用“炎黄子孙”提法的精神。然而，这份文件似乎并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因为紧接着在1999年又发生了苗族知识群体对于电视连续剧《釜山大结盟》的抗议事件。

1999年5月到6月间，湖南电视台播放了由河南新华分社等单位合拍的20集电视连续剧《釜山大结盟》。该剧和《炎黄二帝》一样，同样是以远古时代有关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为题材。剧中对蚩尤的丑化描写，与《炎黄二帝》如出一辙。并且还安排了“大苗”、“二苗”、“三苗”与蚩尤一道，去侵犯炎帝、黄帝的剧情，以此暗示蚩尤与“三苗”之间的关系。^[3]这部电视剧刚刚播出，就遭到了来自苗族社会知识分子的抗议，三大方言的苗族知识份子们首次结集在一起，以“全国各界苗族人士及蚩尤族团平反委员会联合抗议”的署名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公开的抗议书。

抗议书中指出，《釜山大结盟》中对苗族先民蚩尤的丑化，是“试图挑拨民族关系，诱发民族仇恨，扼杀民族精神”。进而对汉族社会中“民族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批判，现将该抗议书一段内容节选如下：

《釜山大结盟》一剧中对中华民族始祖的丑化，对苗族始祖及其先民的丑化，有关部门竟然不干涉，任其泛滥，广大苗族同胞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在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平等这一新型民族关系时期出现歧视、侮辱、侵犯苗族人权的行为。《釜山大结盟》的播放说明，苗族先民被歧视、被否定、被抹杀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严重存在，如现行中学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材原始社会部分对蚩尤族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点也没有提及，教育中华民族子孙一书《上下五千年》的作者们对蚩尤族团也采取否定丑化的态度……。有关部门允许《釜山大结盟》剧的编导与播放，是新时期丑化中华民族始祖、丑化侮辱苗族，试图从精神领域扼杀苗族的集中体现，是引发民族仇恨的导火线！允许该片播放的有关部门，无视“中华民族一律平等”这一新时期的原则，无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历史真实，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4]

在上述这封充满了火药味的抗议书中，可以看到，苗族知识群体们对于“炎黄热”中不断出现的“褒炎黄、贬蚩尤”的现象，已经抑制不住他们的感情，不仅把对这部电视剧的指责提到“侵犯苗族人权”、“破坏民族团结”等空前的政治高度上，并且对于在其它如教育等领域中存在的苗族先民“被抹杀”的现象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来自苗族社会的强烈抵制下，《釜山大结盟》一片在放映途中就很快被迫停播。

上述在宣传“炎黄子孙”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围绕着对于蚩尤评价所引发的来自苗族社会的



不满以至于抗议活动，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产生的呢？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自九十年代以后，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汉族社会中的“炎黄热”以及在苗族社会中“蚩尤热”的情况。

二、“炎黄热”与“蚩尤热”的纠葛

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政治运动中，我们注意到，与过去强调“中华民族”不同的是，形成于 20 世纪初期，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封存的“炎黄子孙”的口号又被重新提起，并成为这次运动展开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此，在中国（主要是汉族社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中，就开始出现了经久不衰，延续至今的“炎黄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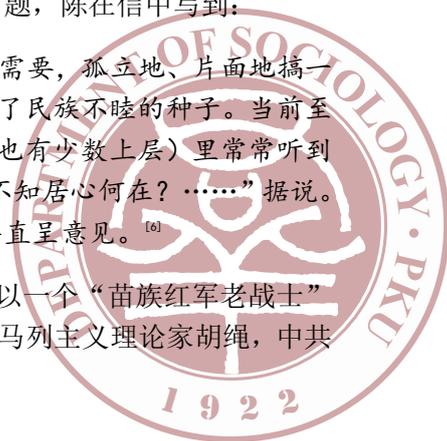
1991 年 4 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名义上它只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但担任该会会长的，先后有周谷成、萧克、费孝通、程思远等人。这些人在中国的政坛上，既是属于“国家级”的领导人物，而且在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如周谷成、费孝通等）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学会成立以后，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举行了多次以“炎黄二帝”为主题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并积极参与支持各地方对炎帝和黄帝的“公祭”活动或以“炎黄”为主题的各种文化活动，成为推动近年来大陆各地兴起的“炎黄热”的最为中坚力量。除此之外，学会还编辑了许多以“炎黄”为主题的出版物，如 400 余万字的大部头资料集《炎黄汇典》和百余卷的《中华文化通志》等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直接或间接支持与协助。其中《中华文化通志》一书出版后，在 1998 年 11 月，该会的领导和部分撰写、编辑人员，还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5]2000 年 8 月，为配合奥运申办运动，经国务院的批准，由外交部、公安部、体育总局、交通部、中国侨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举办了空前规模的“普天炎黄贺千年”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行了多路“中华炎黄圣火”的点火和传递活动。由此可以看出，90 年代以后在中国兴起的“炎黄热”，事实上是得到了国家及各级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与汉族社会中的“炎黄热”同一时期，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中的苗族社会中却兴起了奉传说中与炎帝·黄帝处于对立面的蚩尤为民族共祖的“蚩尤热”的活动。并进而和“炎黄热”言说之间纠葛不断。

1994 年年初，在传说古代炎黄联盟与蚩尤发生了“涿鹿大战”地点的河北省涿鹿县，当地政府决定利用当时正在兴起的“炎黄热”，计划在该地塑造“炎黄像”，修建“炎黄城”，以此作为开发旅游经济的招牌。但是，这一消息被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任职的一名红军长征出身的苗族老将军陈靖获悉后，他当即给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写去一封长信，对于这一举措表示反对。在信中，陈靖针对近年来的“炎黄热”，警告这样做只能在少数民族中产生离心倾向，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建造“炎黄城”以及“炎黄像”反对立场，进而他还建议在涿鹿县修建一个纪念炎帝、黄帝以及蚩尤这三位“祖先”的塑像或建筑物，认为此举才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增强。这其中，针对近年来在汉族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问题，陈在信中写到：

最近四、五年，由于某些人与个别领导者，只顾眼前的一时需要，孤立地、片面地搞一种所谓的“炎黄热”，而忽视了其他五十几个民族，无意中种下了民族不睦的种子。当前至少在十几个少数民族中，正在生长着离心力。我们在中、下层（也有少数上层）里常常听到这样的表白说：“我们不是炎黄子孙”、“那些搞炎黄热的人，不知居心何在？……”据说。据说有好几个民族的负责人，已经向中央部门，甚至向中央领导直呈意见。^[6]

在给涿鹿县领导去信后。陈靖接着又在 1995 年 3 月到 5 月间，以一个“苗族红军老战士”的名义，就蚩尤问题分别致信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胡绳，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元勋、中华炎黄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将军等人以及相关机构。在这些去信中，他充分利用了近年苗学研究中的成果，阐述了“蚩尤”、“九黎”以及“三苗”与苗族之间渊源关系，并通过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追溯，认为“蚩尤既是苗族的始祖，也是汉族的始祖”，批驳了王朝时代以至于民国年间汉文化的“正统观念”将蚩尤打入另册的做法。要求为被视为“苗族最高祖先”的蚩尤“正名”和“平反”，并且将蚩尤和炎、黄一道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7]

陈靖是贵州省瓮安县出身的苗族，1936年，他在红军长征途中参加了革命，长期在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他的信件在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他作为一个老红军、老革命的身份，使得他的去信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分量；其次，他在信中指出的在南方十几个少数民族中产生“离心”倾向的警告，涉及到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的民族问题，也不得不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在收到陈靖的来信后，涿鹿县政府很快取消了原来的计划，重新拟定了建立蚩尤、炎帝、黄帝的“三祖堂”的方案。而当时任“中华炎黄研究会”会长的萧克将军因内部阻力，没有立即表态，其后在他即将卸任会长职务之际，专程给陈靖打了电话，对他的行动和观点表示支持和理解¹。而在陈靖所属的苗族社会中，他的去信更是引起了各地苗族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响。

苗族（英文：hmong）是一支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民族集团。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表明，中国境内的苗族人口共有890万余人，在中国56个民族中（包括汉族在内）位居第五位。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和恢复民族政策以后，在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中“民族意识”普遍高涨的背景之下，各地苗族社会的知识分子中，也以不同的方式纷纷展开增强民族自我归属意识的活动。1989年11月，在贵州省率先成立了以苗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间社团组织——贵州省苗学研究会（以下简称苗学会），其后，在湖南、云南、北京以及广西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苗学会组织。各地苗学会成立以后，在“苗学研究”的旗帜下，苗学会强力推动苗族知识分子对于苗族社会的经济、教育等问题研究，并对苗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发掘工作，成为近年来促进苗族社会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的最为中坚的力量。^[8]然而，在蚩尤问题上，1991年7月，在贵州省凯里市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三次学术年会暨国际苗学研讨会”，来自三大方言区的苗族知识分子们汇聚一堂，确认了奉蚩尤为苗族共同祖先的意向。但除此之外，这时期，在展开的“苗学”研究中，基本上没有看到涉及到蚩尤的研究。

陈靖给中央以及地方的相关部门和领导的信件，在各地的苗族社会的知识分子中被广为传阅，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以此为契机，从1995年开始，在各地苗学会活动中，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股“蚩尤热”的浪潮。以占全国苗族人口将近一半（约420万人）的贵州省为例，1995年11月在贵州省安顺市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五次学术年会上，特别邀请了传说系古代黄帝与蚩尤发生“涿鹿大战”以及蚩尤战败被杀地点的河北省涿鹿县的县委书记与会，就蚩尤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9]1996年8月在贵州六盘水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五次年会暨经贸洽谈会”上，蚩尤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贵州民族报》以《蚩尤始祖地位应肯定——贵州省苗学会第五次年会学术研讨综述》为题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10]来自三大方言区的一些著名苗族学者，如贵州黔东方言的李廷贵（贵州省苗学会会长）和潘定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系教授，系主任）、湖南湘西方言的伍新福（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苗族史》以及《苗族通史》的作者）、西部方言的王正义等，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蚩尤与苗族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要求为蚩尤“平反”持赞同态度的汉族学者，如来自河北省涿鹿县的王大有等也参与这场讨论。^[10]1996年以后，苗学会出版的年度内部刊物——《苗学研究通讯》，除了第10期为《苗族杰出人物》专辑以外，其他的每一期都登载了许多有关蚩尤研究的论文和信息，几乎变成了有关蚩尤问题的“专辑”。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兴起的各地以苗族为主题的网页，都纷纷纳入与蚩尤有关的内容。这其中，由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青年苗族学者们开设的

¹ 2000年9月，笔者对陈靖的访谈

《三苗网》中，还专门设立了以蚩尤问题为中心议题的“祭祖坛”，祭上蚩尤塑像，罗列了许多苗族学者（包括汉族学者在内）的有关蚩尤问题的论文研究资料，并且在其开设的“苗学论坛”留言板中，蚩尤问题也一直成为众所关心的议题之一。

在上述对于蚩尤问题的热烈讨论中，主要围绕的核心主题包括了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在大力宣传蚩尤是苗族祖先的同时，苗族学者们力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蚩尤与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

就蚩尤与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而言，尽管苗族学者根据近代以来部分汉族学者的观点和汉文献记载，一直坚持传说时代的蚩尤及其他领导的“九黎”和其后的“三苗”部落与苗族有着渊源关系。但事实上对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文典籍虽然浩瀚，但是先秦时代的汉文史籍能支撑蚩尤与苗族有关系的材料，其实只有两条：一是诸如《国语》、《礼记》等史籍中有关“三苗”是“九黎之后”记载，可以将苗族间接地和被视为“九黎”首领的蚩尤联系起来。二是如《山海经》等史籍中有关蚩尤所弃之“桎梏”、“化为枫木之林”的记载，可以和现今见于黔东南一带苗族地区的枫木信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仅根据汉文献记载的历史——即所谓的“书史”来证明蚩尤与苗族关系显然很难成为“定论”，如何从学术上“科学地”论证蚩尤与苗族的关系就成为苗族学者们的当务之急。在这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苗族的“心史”材料的登场。

所谓的“心史”，用贵州苗学会首任会长李廷贵的话来说，指的就是苗族“心灵的历史”，即在各地苗族社会中流传的各种民间口头传承。^[11]但是，80年代以前，在苗族三大方言区中收集和整理到的诸多苗族民间口头传承中，并没有看到能够直接证明蚩尤与苗族之间关系的资料。然而，从80年代以后，苗族学者们就在分布在云南、四川一带的西部方言苗族中，不断地挖掘和整理出来了许多有关蚩尤的民间传说。进而95年以后，东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区的苗族学者们也在民间流传的史诗、神话以及巫辞中发现了不少能够证明古代蚩尤与苗族关系的资料。这些被搜集、整理出来的民间资料，继而又成为论证蚩尤与苗族关系的重要的论据。

其次，要求为蚩尤“平反”，肯定其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以及“中华民族”的创始人之一的地位。重新评价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构成了“蚩尤热”中的主要内容。

自90年代以后在汉族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中，在对“炎黄子孙”大力宣传弘扬之际，对于处在对立面的蚩尤则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漠视或者回避的态度。正是这种“重炎黄，轻蚩尤”或者“褒炎黄，贬蚩尤”的现象引发了苗族社会知识分子们的不满。上述陈靖将军在致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信中就指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过去被污蔑、歪曲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闯贼”（明末李自成）、“拳匪”（义和团运动）、“洪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都纷纷恢复了名誉，唯有上古传说中的人物蚩尤被打入到“另册”中。这无疑会招致蚩尤为祖先的少数民族社会的不满情绪。^[7]正因如此，在1995年以后苗族社会中兴起的“蚩尤热”中，论证蚩尤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要求重新评价蚩尤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问题就成为“苗学”研究以及苗学会活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上述来自苗族社会要求对于蚩尤的再评价呼声，由于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安定团结”的大局，因而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学术”的界线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炎黄热”兴起以后，与陈靖上书几乎同一时期，对于蚩尤的历史地位的再评价的动向也出现在一部分政府官员和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汉族学者中。据北京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庚称，早在1993年他到涿鹿县考查有关炎帝、黄帝、蚩尤的文化遗存期间，就开始意识到传统史学中只谈炎黄，不提蚩尤的这一历史观所存在的“局限性”。因此，1994年4月，他给涿鹿县政府提出了建立“中华始祖文化村”的设想，将蚩尤同炎帝、黄帝一同列入到中华始祖的行列中。据他说，这一设想在当时就得到了国家旅游局的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们的肯定。^[12]此外，河北涿鹿县县委副书记任昌华认为所谓的“炎、黄、蚩三祖文化”的观点，最初是他在1993年10月提出的，其

后得到了地区政府以及省一级党委宣传部门主管官员的认同，也得到了国内部分学术团体，如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研究会、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等学会中的一些负责人和学者的支持。

[13]

在苗族学者要求为蚩尤“正名”和“平反”的呼声中，主流社会中的部分汉族学者也纷纷著文响应。1995年9月，在涿鹿县政府的主持之下，在涿鹿县召开了“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肯定了蚩尤在历史上作为与炎帝、黄帝同为“中华始祖”的地位。会后还成立了“三祖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团体。1997年，在河北省的涿鹿县，建起了象征“中华民族”最早起源的“中华三祖堂”。在这座辉煌的殿堂内，摆上了“炎帝”、“黄帝”、“蚩尤”这三个代表了“中华民族”起源的祖先的塑像。1998年7月，在涿鹿县又召开了“全国第二届涿鹿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除国内的学术团体和学者以外，还有美国、老挝的华人和苗人代表共300多人与会。在这次研讨会上，贵州苗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廷贵先生代表苗族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此外，会议期间还为落成的“中华三祖堂”纪念馆举办了盛大的开馆仪式，元贵州省省长、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兼贵州苗学会会长王朝文在剪彩仪式上致辞，来自贵州赫章等地的苗族芦笙队，以及由贵州苗学会组织的苗族歌舞团和艺术家，身穿民族盛装，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可以说，作为蚩尤后代的苗族的参与，成为上述研讨会与“中华三祖堂”开馆仪式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14]

然而，上述在苗族社会和部分汉族学者及政府部门中树立“炎帝”、“黄帝”、“蚩尤”为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的动向，在近年兴起的“炎黄热”中，只能算是一段小插曲。苗族社会为蚩尤“平反”的诉求，事实上一直受到外界会有形无形的抵制。早在《炎黄二帝》播出前，一些学者在非公开的场合就提出了非议：苗族要求将自己的祖先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开创者，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如果每个少数民族都提出同样的要求的话，那么怎么办？此外，还有一些人甚至引用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祭祀黄帝陵时写下的那段有名的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想像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来加以反驳。90年代后期先后播出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和《釜山大结盟》中对于蚩尤这一人物的丑化，事实上也是汉族社会中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一种公开反映。

以上在“炎黄热”与“蚩尤热”中，围绕着中国古代传说人物炎帝、黄帝以及蚩尤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在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我们似乎又嗅到传说中五千多年前发生在中原的那场战火的硝烟。其实，这一系列争论的背后，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从王朝体制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换过程中，苗族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以及以“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言说所代表的不同的国民整合路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在以下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的整理与展开。

三，“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近代中国国民整合的两条路线

1903年以后开始的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初是在“排满”的口号下进行的。统治中国的满清政权，被贴上了“异族统治”的标记。而几乎与此同时，革命派在对于“种族”的各种议论中，以“黄帝”作为“汉种”或“汉族”始祖的言说就逐渐流传开来。^[15]然而，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过去清朝帝国的版图也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面对“中国”这一国家领域内存在着多民族的现实，革命前形成的“炎黄子孙”的这种单一的种族主义的思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家的现实的需要。于是，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作为国民国家整合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提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16]但是，这时期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基本上是以汉族和汉文化同化中国境内的其它非汉系族群为中心展开的理念。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但在以汉文化为中心这一点上，双方又是一种互补的

关系。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在上述两种言说之间表现出来的“外向与内敛”以及“传统和近代”之间的差别。

首先，就前者的关系来说，“炎黄子孙”的言说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前的“排满兴汉”的反清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强调的是“种族”关系而超越了“国家”的界线。而这种“种族论”就其本质看，它仍然是汉字以及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中心表现出来的。这一言说的诞生和流传，最初是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侨中，因而在海外华人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也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而“中华民族”（或“五族共和”）最初则是以整合“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的不同族群为目标提出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新成立的近代国家体制基本上继承了过去王朝帝国的版图。在这一新生的国家中，不仅有“炎黄子孙”的汉族，同时，也包括了这之前被为视为“异族”的满族以及众多的非汉系族群在内。如何强化和整合这些不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就成为当政者首要的急务。因此“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炎黄子孙”相比较，将其对象、范围明显地收束在“国家”的范围内，故具有较为强烈的内敛性。

其次，就“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而言，“炎黄子孙”的口号并不单纯是表现“共同的祖源”的言说，并且也是对于传统的“天下”观念以及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汉文化的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换句话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在由王朝体制向国民国家体制的艰难转换的胎动过程中，一方面，近代国家的明确的疆界划分、民族（国民）意识、主权在民思想等观念逐渐取代了过去朝贡体制下的宗主主权思想，以君主为中心的王权思想等；^[17]另一方面，通过“炎黄子孙”等种族主义言说的展开，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基于王朝时代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华夷之辨”和“天下”观念的扩张和变化的过程。过去被视为“化外之民”的海外的华人，在这一话语体系之下，也被有机地组合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华”范围之内。海外华人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在他们的文化认同却是和“中国”连为一体。在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活动中，他们给予了革命派大力支持而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同样的，中国国内对于侨居海外的这一些华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例如，在面临民族存亡危机的中日战争时期，人们探讨“边疆”问题时，就时常把“边疆”概念区分为“政治的边疆”和“文化的边疆”这两种不同的层次。前者主要指的是主权国家的“中国”所统辖的范围，而后者不仅包括了过去在文化上被视为“他者”的“中国”疆域的非汉系族群，而且还包括了过去被王朝政权视为“化外之民”的海外华人。著名的民族学家吴文藻在抗战时期就一直非常关注“边政”问题，他撰文指出：中国国内的“边胞”（分布在边界地区的非汉系族群）作为“国防的前线”，只是代表了中国的“有形的边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则是“国防的外围”，代表了中国的“无形的边疆”。^[18]他这里提出的“有形的边疆”和“无形的边疆”，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的中国”和“文化的中国”两种形态，事实上是将近代的“国家”概念和传统的“天下”观念都包含在其中了。

无论上述的“政治的疆界”和“文化的疆界”的界定也好，还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提法也罢，其实两者之间在语义上有相当部分是重迭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在从王朝体制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直隐约地贯穿着两条不同的整合路线：一条是以“中华民族”的口号为代表的“国民的”整合路线。它基本上是以分布在“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的各个民族为对象。另一条则是“炎黄子孙”的言说为中心展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的”整合路线。它表面上虽然是以“共同的祖源”的想象为纽带，但实际上却是以基于汉字以及传统的儒家文化形成的共有的价值观为内核，将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连成一个文化的以及命运的想象共同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在“汉文化中心思想”的影响下，这两者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别开来。许多场合下，“中华民族”不仅指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并且也把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包括进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直至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炎黄热”中，我们还可以时常看到将“炎黄



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的现象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的宣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实际上我们很少看到有关“炎黄子孙”的宣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实际的政策层面上，对于海外的华人、华侨甚至采取了一种近似于敌视的态度（例如，这时期连具有“海外关系”本身都会构成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对于在 1980 年代以前的中国，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以围绕着“国家”为中心的国民整合的过程。

这种状况一直到 80 年代的初期才发生了变化。这时期，随着民族政策的恢复和对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内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步步高涨。而随着来自海外华侨的投资在中国的外来投资经济比重中逐步加大，加上面临台湾独立、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等问题，对内如何加强中国国内各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对外如何强化世界各地华人和港澳、台湾同胞对于中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就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的政治课题。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热潮。在这次运动中，值得注意的就是以“炎黄子孙”这一充满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口号的重新出台。

导致 90 年代以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政治运动出现的背景，不用说，它与 89 年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复杂局面有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炎黄热”现象，也昭示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向传统的“中华思想”悄然回归的一面。围绕着“炎黄子孙”言说的展开过程，我们看到，在汉民族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汉文化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开始抬头，“炎黄子孙”甚至与“中华民族”同一而视之。如“中华炎黄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鲁淳在他的一次发言中就提到：“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与发展；今日中国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我们要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对炎黄二帝始兴和代表的中华文化有所了解，中华文化的许多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极其时代（中略）。古今源流，虽然相隔五、六千年，却是一脉相承的”。^[5]在这里可以看到，过去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强调，通过“炎黄子孙”言说的展开，变成了“一元一体”；“炎黄二帝”成了“中华”的源头与主体；“炎黄文化”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换句话说来说，“中华民族”也在这一意义上被巧妙地与“炎黄子孙”融合起来。

上述这种将“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混同的看法，被苗族学者指责为是一种典型的“大汉族主义”以及汉文化“正统观”的表现。其实，这两个概念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事实上也是很难重迭在一起的。将“炎黄子孙”作为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祖源”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将其等同于“中华民族”，实际上也等于否定了官方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基调。

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兴起的初期，对于“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这两个提法间所隐含的区别，实际上官方并非毫无意识。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0 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到中央工作以后，从整体对一些问题做了些研究。我感到，‘中华民族’这个词，比我们过去常讲的‘炎黄子孙’的概括性更强，它包括了我们的各个民族”。^[19]其后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受到苗族社会的抗议以后，尽管中央部门也发文规定要限制“炎黄子孙”媒体上的使用。但是，这似乎根本难以阻止在汉族社会中“炎黄热”持续升温的势头。对于单方面宣传“炎黄”会引起的负面效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也只是在其内部的文件中表明：宣传“炎黄”的同时，也要注意照顾到少数民族的感情云云。也就是说，传说中处于炎黄二帝对立面的蚩尤，在这里明确地是与汉族区别开来而将被划到“少数民族”的阵营中。由此看出，苗族社会中的“蚩尤热”和汉族社会中“炎黄热”之间发生的纠葛中，我们看到：事实上它也是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及近代以来的“国家”（“中华民族”）与“民族”（“炎黄子孙”）这两条不同的整合路线之间表现出来的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冲突。苗族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场合都强调：“我是中国人，但不是炎黄子孙”，对在“炎黄热”过程中“褒炎黄、抑蚩尤”的现象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电视剧《炎黄二帝》之所以会不顾苗族的反对而播出，并且将被苗族视为自己民族始祖的蚩尤置于对立面，其背后的原因，正如广播电视部部长孙家正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的：“编织这样一个故事，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期望……，也符合全世界华人的感情和心理”的那样，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分布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汉族或华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而策划出来的。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在90年代以后兴起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面对蓬勃兴起的“炎黄热”，同样是“中国人”的国内的少数民族，除了苗族知识分子公开的抗议之外，其它少数民族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淡而出现了“一冷一热”的现象。对于这一事态可能会导致的民族问题，如前所述，一些政府部门和汉族学者也试图通过“三祖共立”来加以弥合，但从以下所叙述的电视剧《涿鹿大战》的流产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努力事实上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强大阻力。

四、电视剧《涿鹿大战》的流产与“南长城点火”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就在与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拍摄的几乎同一时期，同样在“中华炎黄研究会”内部，也在酝酿着表现同一历史题材的另一部电视连续剧《涿鹿大战》的制作。同样表现的是炎帝、黄帝联盟与蚩尤的战争的这一历史的题材，但这部电视剧剧本但故事表现的主题和内容上，却与《炎黄二帝》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炎黄二帝》中将蚩尤塑造为一个野蛮、暴虐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是，《涿鹿大战》这部电视片在表现五千年前发生的这场大战的时候，其剧情中没有安排一个反面人物。有关于此，最初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委托而从事这一剧本创作的汉族作家黄谷子在他的创作构想中就写到：

如果人们放弃传统的历史偏见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维护民族大家庭团结的整体利益出发，用唯物史观去审视‘涿鹿之战’会得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概念。即“涿鹿之战”是我国原始部落文化的第一次大撞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我们不应当在五千年前祖宗们的成败中寻找慰藉或怨恨。^[10]

正是从“维护民族团结”的大义名分出发，作者力图从“融合”的角度对于这场传统上被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进行一次观念转换的重构。1996年，该电视剧剧本的初稿完成，并于1997年初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研讨会，据说有20多位将军及200多名学者参加了讨论。从会议地点及参加人数规模看，规格不可谓不高。其后在《炎黄二帝》引发苗族社会的抗议风波以后，《涿鹿大战》剧本的作者进而主动与贵州苗学会的苗族作家以及学者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剧本的内容及构成等问题。“贵州省苗学会”也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一道，成为《涿鹿大战》的创作组织委员会的单位成员之一。

然而，反映新的“历史概念”的《涿鹿大战》电视剧至今仍然未与观众见面。而同期制作的《炎黄二帝》和其后产生的电视剧《釜山大结盟》却顺利播出。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以外，了解内情的陈靖就指出主要是受到来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内部一些反对意见所致。而《涿鹿大战》剧本的作者也因各种原因，在北京无法创作下去，只好求助于贵州苗学会，来到贵州，寓居在李廷贵宅中继续从事剧本的撰写。结果，也因无法获得资金支持而流产。其后陈靖在一片文章中指出：《釜山大结盟》是中国作家协会苦心经营的产物，作为《炎黄二帝》姊妹篇，也是经过广播电视部批准的，这不是正好与他们1997年针对《炎黄二帝》所发的49号文件的精神背道而驰吗？在这里，他讽刺道：“莫非炎黄子孙中出现‘信仰危机’，从而把党的民族政策置于不顾，要揪出五千年前的蚩尤来作为‘靶子’，大加诛伐，以增加那一份‘凝聚力’？”^[20]

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和《釜山大结盟》受到苗族知识分子的抵制后，最终停止了播出。

但是，广播电视部有关限制使用“炎黄二帝”提法的文件似乎对于汉族社会中的“炎黄热”丝毫没有起到抑制的作用。尽管中央发文限制使用“炎黄子孙”，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内部文件中（1997年7号文件）只是把它视为“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论范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1]。这些事实和现象表明：近代以来，“炎黄子孙”言说在主流社会中已深入人心，要想在现实中改变蚩尤的“残暴”形象绝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这从九十年代曾流行一时的国内制作的网络游戏《轩辕剑》中，“蚩尤”依然被设定成游戏中最大“魔王”也可窥见一斑。^[21]

2000年8月，为配合奥运申办运动，经国务院的批准，由外交部、公安部、体育总局、交通部、中国侨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举办了空前规模的“普天炎黄贺千年”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行了多路“中华炎黄圣火”的点火和传递活动。意味深长的是，也许是组织者意识到了这一活动会引发的负面效应之关系，便特别将其中一路的“炎黄圣火”的火种，选择在了苗族聚居区的湘黔边境的“南长城”——过去中央王朝为防止“生苗”的侵入而在湘黔边界修筑的城墙遗址下点燃。那一天，还特意安排一对“汉族”和“苗族”的男女青年在“南长城”下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并由他们点燃了“炎黄圣火”的火种。^[22]但是，对于这一以“汉苗联姻”作为象征苗汉之间“一笑泯恩仇”的创举，苗族知识分子非但感到欣慰和认同，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对于过去的痛苦记忆与愤怒。据说，就在结婚和点火仪式举办的前一天晚上，一场大雨，冲毁了在“苗疆长城”旁搭起的典礼台，苗族老一辈学者巴青达络·熊喀（苗青）在他的一篇杂文中，将此揶揄为“炎黄要来取火，蚩尤发怒灭火”。^[23]而苗族青年作家龙建刚在《三苗网》上刊载的一篇题为《别人的奥运会》的杂文中写道：

今年8月25日，新华社有篇“四路炎黄圣火在长沙汇集”的专电，其中一路是在湘西凤凰县苗长城下点燃。当然，选择在什么地方点火是人家的权利，但在苗疆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带点燃的火焰却被命名为“炎黄圣火”，我们忍不住要好好想想：同志哥，你们搞的是什么名堂？翻开历史，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苗长城上的每一个砖头都沾满了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鲜血，它至今仍然弥漫着浓浓的腥味……。这样的“圣火”，应该灭了算球。”^[22]

结语

当今社会，“民族”或“民族集团”常被视为一个具有最大外延的“假性血缘团体”。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民族共同祖先想象、追溯与树立，必然地就成为整合、强化自身民族认同意识的最为基本的和核心的内容之一。自90年代以后在汉族社会和苗族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和“蚩尤热”，至今仍然在行进之中。2000年8月17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境内的香炉山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苗族，隆重举行了“蚩尤陵园”的奠基典礼；2001年8月9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一尊巨大的“苗族始祖蚩尤像”雕塑举行了落成典礼。另一方面，“炎黄热”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各地华人中持续高涨。2004年以后，对黄帝陵的祭拜仪式升格为国家级；2006年清明节，世界各地华人万人公祭黄帝陵。而苗族社会要求将“蚩尤”树立为中华民族祖先的呼声一直从未停止过。上述“蚩尤热”与“炎黄热”的兴起与碰撞，从中显现出来的中国近代国家体制下国民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龟裂现象，该如何解释与总结，尚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杨培德，“电视剧《炎黄二帝》播出引起苗族强烈不满”，《苗族研究通讯》第八期，贵州省苗学会秘书处编，1997
- [2] 广播电影电视部司局文件（1997.49号），《苗族研究通讯》第九期，贵州省苗学会编，1998
- [3] 吴治清，“重蹈旧辙的遗憾：评电视连续剧《釜山大结盟》” [2002-1-13]，三苗网。



- <http://www.3miao.com/ancestors/ciyou/>
- [4] 全国各界苗族人士及蚩尤族团平反委员会联合抗议. [2002-1-15].三苗网.
<http://www.3miao.com>
- [5]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鲁淳, “2002 年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2003-2-25]. <http://bjic.balji.gov.cn/dzkw/shkw/02q354.htm>,
- [6] 陈靖, “陈靖将军致涿鹿县委、县政府的公开信” (1995-3), 作者本人及贵州省苗学会秘书处提供复印件。
- [7] 陈靖, “陈靖将军致李瑞环同志的信件” (1995-4); 陈靖, “陈靖将军致胡绳同志的信件” (1995-4), 作者本人及贵州省苗学会秘书处提供复印件。
- [8] 杨志强, 《从“苗”到“苗族”: 近代民族集团的形成及其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再构筑过程》(第四章, 第五章) (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 2005-6)。
- [9] 《苗学研究通讯》第六期, 贵州苗学研究会秘书处编, 1996
- [10] 《苗学研究通讯》第七期, 贵州苗学研究会秘书处编, 1997
- [11] 李廷贵, “论蚩尤和九黎三苗的关系”, 《苗族研究通讯》第八期, 1997
- [12] 龙建刚等, “给蚩尤以公道, 还历史以真实: 北京汉族学者李庚谈炎黄蚩尤三始祖”, 《贵州民族报》.1995-11-27 (3)
- [13] 任昌华, 简谈“三祖文化”始说. 《苗族研究通讯》第九期, 1998 年
- [14] 全国“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涿鹿举行. 《苗族研究通讯》十一期. 2000
- [15] 孙隆基,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历史研究》2000 (3): 68-79
- [16] 村田雄二郎, 中華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最後の帝国”. 蓮實重彦, 山内昌之編: いま、なぜ民族か.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4
- [17] 王立新,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抗美货运动”, 《历史研究》2000 (1): 21-33
- [18]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1942 年),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1990
- [19] 江泽民总书记与台湾“统联”访问团共话祖国统一.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3-12 (2)
- [20] 陈靖.蚩尤问题一辩. [2002-3-3], 三苗网: <http://www.3miao.net>
- [21] 网络游戏: 轩辕剑. [2002-2-21] <http://games.sina.com.cn/z/xy/>
- [22] 龙建刚, “别人的奥运会”, 三苗网: “世纪龙语”栏目[2002-1-13] <http://www.3miao.com>
- [23] 巴青达络·熊喀, 老天爷不答应: “中华炎黄圣火”在南长城索取火种的故事.三苗网: [2002-1-17]<http://www.3miao.com/ancestors/ciyou/essay/tianlaoye.htm>

【论 文】

“苗女”争论及其背后

——论 80 年代初期的苗族知识界的民族意识的“骚动”¹

杨志强

在现代对国民国家民族集团问题的讨论中, 其民族集团的自我认同意识, 以及相互之间在互动状态下“内外境界”的形成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²。苗族是中国人口位居第五位的少数民族,

¹ 本文刊载于《青海民族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 2010 年 1 月, 第 5-13 页。日本版刊载于《中国研究月报》2002 年 9 期, 日本中国研究所。

² 本文所使用的民族境界这一概念, 主要以日本学者江渊一公所作的定义为参考。即: 所谓的民族境界, 是指

